

中国现代两大文豪论

ZHONGGUO
XIANDAI
LIANGDA
WENHAO
LUN
ZHONGGUO
XIANDAI

6.6

HE

孙克伯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昌

珞珈山



序

陆耀东

我和党伯同志相识已30多年。60年代初，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时，我们开始共同切磋学术。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成了知己。他治学严谨，重水磨功夫，不轻易将论著问世。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郭沫若评传》。1964年，论文答辩通过后，刘缓松先生等都认为可以发表，但他没有寄出去。文化大革命后，我和其他同事几次催他早日完成这部专著，他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到1987年才将书稿送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发行后，在学术界普遍受到好评。

我认为：做人应以实事求是为圭臬，学术研究当奉科学性为上帝，不能轻率跟“风”。指鹿为马，斥是为非，不管打的是何种神圣旗号，用的是怎样至美的言辞，也不能不受到学术本身的惩罚，难以得到学术界同人的谅解。党伯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颇受重视，被调到省里工作，但不久他见武汉大学中文系同事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被罚劳动改造，便愤愤不平地提出异议。结果自然是厄运君临。对有些并不涉及国计民生的学术问题，党伯同志也是如此。如郭沫若同志1928年用杜荃的笔名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过去，人们为贤者讳，不曾说出作者。而党伯在70年代末就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这肯定是郭老所写。近十余年来，他是编辑《闻一多全集》（十二卷本）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主持注释《鲁迅全集》中的《热风》，参与编辑、注释《郭沫若全

集》等，为了核对原文、校勘版本，查阅史料，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闻一多先生的未刊稿《真我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次将其中的11首收入《闻一多诗集》出版，功不可没。然而，党伯同志经过校勘，发现《闻一多诗集》中这11首诗从标题到字句、标点符号、错漏及衍文共计152处，其中诗题严重错误1处，漏一行诗的1处，同一首诗将其中几行另行独立为一首的1处，错得最多的《志愿》，计36处。工作粗细不同，成果质量有天壤之别。有一段时间，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不重视版本问题，影响了研究论著的质量。就郭沫若研究而论，由于对《女神》各种版本缺乏了解，许多研究论著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即使楼栖先生这样著名的诗人和学者的并非粗制和泛论的专著《论郭沫若的诗》中，也留下了遗憾。书中说，《匪徒颂》“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诗人对‘鼓动’阶级斗争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作了热烈的歌颂。”实际上，初版本的《匪徒颂》，并未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1928年作者修改时，才将原来写的罗素、哥尔栋去掉，换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对郭沫若同志“五四”时期写的《女神》的论断也就落空了。俗语说，于细微处见功夫。党伯同志不忽视这些所谓细微末节处，因此，他的论著中无“硬伤”，且给人以厚实之感。

至于学术观点和具体论述，党伯的论著似乎象唐弢先生肯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时所说：沉稳持重，有特色。不着激烈之词，不作偏激之论，但力求在前人和同时代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这是收在本书中大多数论文的共同特点。鲁迅研究方面，如《论“五四”时期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就纠正了某些历史书和哲学史著作的误断。有的历史书说，赫胥黎的《天演论》，“用生物的自然竞争来代替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本质上是反动的，它为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有的哲学史著作说，《天演论》的下半部“把生物的科学原理错误地套用到社会领域，是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党伯同志仔细研究了严

复译的《天演论》和别的译本，发现《天演论》并非如上述论著所说。《天演论》明白地说：“人择之术，可行诸草木禽兽之中，断不可用诸人群之内”；“把进化原理应用到人类社会来的严格的科学方法，是很难用于实际的政治领域的”。党伯此文还指出：《天演论》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有两种法则，一是如同生物界一样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法则，这是宇宙过程；一是人的道德、情感、思想、良心的进化，即伦理过程。在人类社会初期，宇宙过程占支配地位；社会愈进化，伦理过程所起的作用愈大。鲁迅“五四”时正是因为对赫胥黎的这一观点有同感，所以特别强调改造国民性、民族“根性”的重要性。这一观点，是《论“五四”时期鲁迅的进化论思想》的独特贡献之一。又如《关于郭沫若和泛神论的关系问题》一文，研究的是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此文通过细密的分析论证，说明郭沫若的“泛神论”并不是真正的泛神论，至少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泛神论，或是不完全的泛神论，而是经过他主观解释的郭沫若式的泛神论。对老问题提出了新见解。

学术事业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有赖于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发现新的重要资料，有赖于不断地提出新的或更科学的见解，不断在局部或整体上提高学术水平。人云亦云、重复前人的见解，是最易作到的，但学术事业也就停滞不前。而要提出真正的新的学术观点，则是十分艰难的。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我钦羨在学术上多有创见的同志。至于在学术园地花丛中纵野马的人，我认为他们不仅对学术事业发展的规律无知，而且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

党伯同志治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文学研究中，是

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出发，注意文学现象产生的文化背景，注意种种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的影响，注意特定历史环境和作家的特殊情况，与此同时，更注意从美学的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的《编后记》中说：“我们坚持的选诗标准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既要注意诗歌的时代性、战斗性及其在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也要注意它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诗首先必须是诗。同时，还要注意题材、风格、流派的多样性，以及地域和作家的代表性。”这里虽然是谈选诗标准，其实也可看作是他研究诗及其他文学现象的原则。应该说明，采取这种观点和方法，是我国五、六十年代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多数学人的共同特色。一般而言，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议论文学现象较少风险，而以美学的观点品评则易于受到“左”的方面来的非议，尤其是对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以外文学流派的作品，有的人似乎非置之死地而后快。所幸党伯的文学研究成果，迄今尚未受到攻击。我想，这大概也和党伯同志治学“沉稳持重”有关。他的某些评议，往往采取“春秋笔法”。读者如仔细阅读，可知道其分量；如匆匆扫瞄，则不易领会其真正含义。

我的这些肤浅的看法，不知读者朋友以为然否？

1993. 2. 20



孙党伯，男，祖籍湖北黄冈，1934年12月生于武汉市。1956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习，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闻一多研究室主任、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秘书长、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个人专著有《郭沫若评传》等，与人合著的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鲁迅的前期思想》、《鲁迅及其作品》等。

目 录

序	陆耀东
论《阿Q正传》	1
论鲁迅“五四”时期的思想	12
谈鲁迅“五四”时期的进化论思想	31
关于《泼克》	47
郭沫若对现代学术思想的贡献	51
关于郭沫若和泛神论的关系问题	100
郭沫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	116
一曲“五四”精神的颂歌 ——读《女神》	125
论《恢复》	134
谈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	147
郭沫若传略	157
郭沫若在日本	199
郭沫若在武汉	205
《女神》中最早的诗究竟写于何时	212
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是何时回到上海的	216
郭沫若诗文写作时间正误	220
附录:	

读闻一多的遗诗《真我集》 231

后记 249

论《阿Q正传》

《阿Q正传》作于1921年底，是鲁迅小说中最优秀的一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它已被翻译成数十种外文，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这篇作品所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农村的社会生活。它通过对阿Q这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的艺术典型的塑造，广阔地展示了当时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生活图景，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真实地反映并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①我们从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鲁迅的这篇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窥见当时整个历史时代的轮廓，强烈地感到时代的革命脉搏。

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闭关自守的封建制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力的生活。”^②《阿Q

①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1页。

正传》所写的未庄，正是旧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里，一方面是贫苦的农民，特别是象阿Q、王胡、小D这样被夺去了土地和其他一切的雇农，他们备受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挣扎在死亡线上；另一方面，是赵太爷、钱太爷这样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者，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而且把持了政权，垄断了文化，对农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他们是未庄的太上皇，是一批穷凶极恶的坏蛋。赵太爷有钱有势，可以讨小老婆，阿Q却因为向赵府的佣人吴妈求爱，遭到了无情的迫害：赵太爷不仅扣发阿Q应得的工钱，扣留他的破布衫，还要他带着香烛去磕头，赔罪，从此不准阿Q踏进赵府的门槛，地主阶级的爪牙地保又夺走了阿Q的一顶毡帽，作为酒钱。更为严重的是在遭受赵府的迫害后，人们不要他做工，使他挨饿以至被赶出了未庄。有一次，阿Q说他姓赵，赵太爷却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并打他一个嘴巴，赵太爷依仗自己的权势，连阿Q姓赵的权利也被他剥夺了。未庄所存在的严重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农村生活的写照。

如果说辛亥革命前的未庄还是一潭平静的死水的话，那么，辛亥革命的浪潮在这里却激起过一阵浪花。

当辛亥革命的消息刚传到未庄的时候，生活在最底层的阿Q立即从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恐惧中，朦胧的意识到革命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因而便有些“神往”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

.....

“老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关，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

“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Q哥，象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Q说着自去了。

大家都恍然，没有话。赵太爷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到点灯。赵白眼回家，便从腰间扯下搭连来，交给他女人藏在箱底里。

这一段生动的描写，活画出辛亥革命最初在农村引起过震动的情景。一向剥削、欺压阿Q的赵太爷，却怯怯地喊他作“老Q”，向他巴结讨好了。生活富裕的赵白眼也在阿Q面前装穷叫苦，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而这一切却使阿Q感到异常高兴。

然而正当阿Q躺在土谷祠里兴奋地编造他的“革命”的美梦时，赵太爷的儿子赵秀才便和钱太爷的儿子假洋鬼子勾结起来，抢先“革命”了。假洋鬼子是一个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紧密联系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以往，赵秀才和他并不相合。但当赵秀才听到革命党已经进城的消息后，便立即将辫子盘在头上，去拜访假洋鬼子，两人谈得很投机，并相约去“革命”。他们想了又想，终于一同到静修庵把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革掉”了，

并顺手拿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等阿Q来到静修庵时，老尼姑告诉他“秀才和假洋鬼子”“已经来革过了”，使他很觉意外。赵秀才还通过假洋鬼子花四块钱买了一块“柿油党”（即“自由党”的讹音）的银桃子（徽章），算是进了革命党，赵太爷因此又神气起来。而阿Q“要投革命党”，却遭到假洋鬼子的拒绝，不准他革命。

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走，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①《阿Q正传》异常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的这种不彻底和失败。在未庄，这场所谓的革命，只是打碎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别的一切都无变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还是赵太爷、钱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一流的人物，农民仍然过着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阿Q因此感到很失望：“既然革了命，不应该只是这样的。”在城里，除了剪了几条辫子而外，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还是当权。最后，阿Q被地主豪绅所把持的“革命政府”诬为盗犯而枪决了。这一切都形象地说明：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不仅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反帝反封建，而且同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他们不仅没有重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懂得农民革命力量的重要性，不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而且害怕农民革命，这便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②

《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的深刻揭露和批判，是有极其重大

①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4页。

②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页。

的社会意义的。一九二一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革命正处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换的重要关头。这时，伟大的鲁迅用他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形象地说明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没有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是不能完成的，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不能担负起领导农民完成民主革命的责任。这就是说，象辛亥革命那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尽管这篇作品还没有明确具体地指出新的道路，但它表现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催促人们去探求新的革命道路。总之，对辛亥革命的深刻尖锐的批判，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成就。

《阿Q正传》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

阿Q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他是一个连姓名籍贯都有些“渺茫”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流浪的雇农。他没有土地、农具、房屋、家小，“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不但受着极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生活贫困不堪，而且经常受到极残忍的侮辱和轻蔑。他在赵太爷家里做工，吃过晚饭后，还要赤着膊舂米。在未庄，没有一个人同情他，闲人们只拿他取笑；忙时还有人记得他，闲时就把他忘记了。他质朴，也“真能做”，但却被地主阶级吸干了身上的血汗。阿Q这种悲惨的境遇，是旧中国封建社会农村中大多数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的真实的写照。

阿Q又是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他的严重缺点，主要是害怕批评、盲目自尊，自轻自贱、健忘、欺软怕硬等等，这便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的表现。

他对自己的缺点，不敢正视，最害怕别人批评。例如他头上长了癞疮疤，自己不愿说，也怕人家说，愈是这样，人家说得愈厉害，结果闹得很被动。

他“自尊”，但这种所谓自尊，只不过是受压迫受剥削受凌辱

而又不求积极的反抗，仅仅满足于精神上的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罢了。这样，他的自尊也就很容易转变为自轻自贱。

阿Q的所谓“精神上的胜利”，不过是失败时的自我安慰。这样的“转败为胜”，实际上是想用虚假的优胜感去忘记自己被压迫、受侮辱的境遇。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还以为是打了别人一般，是想忘记自己的痛苦；被“假洋鬼子”的手杖在头上“拍拍”打了之后，也使他觉得“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阿Q对于耻辱和痛苦的健忘有时达到惊人的程度，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向吴妈求爱，被赵秀才的竹杠打了之后，他便跑去舂米，很快就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当吴妈哭着要寻死，赵府上闹哄哄的时候，阿Q还赶去看热闹，并感到“有趣”，甚至想打听是出了什么事。

阿Q的落后和不觉悟，还表现在他往往不能认清自己真正的敌人，甚至在受辱之后向比他更弱的人去泄恨。例如，在他向吴妈求爱而遭迫害以致失业、挨饿的时候，他不去反抗造成这个悲剧的赵太爷和封建礼教，反而认为是与他同命运的小D夺了他的饭碗，便和他相互扭打起来。当他被王胡打败，又遭了假洋鬼子的棒打之后，便去欺辱比他更弱小的没有反抗力的小尼姑，以博取闲人的开心。

十分明显，阿Q的这种害怕批评、自尊、自轻自贱、健忘、欺软怕硬，或者说这种阿Q主义，都是用自我安慰的办法，以忘记自己的被压迫的境遇，因此他在受尽压迫和侮辱，屡遭失败的情况下，还自以为取得了胜利，即“精神的胜利”。这种“精神胜利法”却正是他走上实际的反抗道路的严重的思想障碍。

阿Q是一个备受压迫和侮辱的雇农，为什么在他身上又存在着这样严重的缺点，或者说为什么“精神胜利法”在他身上表现得如此突出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人否认阿Q是农民，或者从阿Q

说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这句话，断定他是从地主破落下来的，与一般农民不同。这种看法是幼稚可笑的。前面已经说过，阿Q的雇农身分是确定无疑的。“先前阔”只是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的一种表现。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句话来断定他的阶级身分，正如我们不能根据阿Q说过“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这句话，就断定他是阔人的老太爷一样。我们必须从整个作品所反映的矛盾冲突去分析人物的性格，不能抓住一两句话做文章。

二、有人认为阿Q是中国人精神方面的各种毛病的综合，或者说他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说他主要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是一个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的集合体。这种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它把阿Q这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看成概念化的不真实的人物。我们知道，阿Q这个艺术形象，不仅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同时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在《阿Q正传》里，阿Q的性格从头至尾都是统一的，他的思想和言行，都是和他的身分、社会地位和特有的性格很和谐的。他决不是一个用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拼凑起来的怪物，而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旧中国的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的典型。

三、有人虽然承认阿Q是过去的落后的农民的典型，但又认为“阿Q精神在不同的阶级的人物身上都可以见到”，“并非一个阶级的特有的现象”，或者说“也概括着其他阶级的奴隶主义和失败主义的通病”。这种看法也是不恰当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分析阿Q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胜利法”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从“精神胜利法”的产生谈起。

我们认为，“精神胜利法”决不是农民阶级本身所固有的阶级特性。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来说，这种消极可耻的“精神胜利法”是和他们的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他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忘记现实的压迫和困苦，他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欺骗自己，他们更不

可能去欺压别人。“精神胜利法”的真正产生者，是剥削阶级，是经过中国封建文化熏陶的处于没落时期的封建统治者及其大小奴才们。在中国，一切末代王朝的统治者，都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精神胜利法”，清王朝的统治者尤甚。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和压迫，使老大腐朽的清王朝崩溃下来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外卑躬屈膝，对内残酷压迫人民的奴才相，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生活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了，清朝的将军奕山向英军屈膝求降。却诬报打了胜仗。明明是帝国主义用枪炮逼令通商，而清朝皇帝却说什么“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许多卖身投靠的洋务官僚，鼓吹“宁与外寇，不与家奴”的可耻的奴隶主义；许多为虎作伥的洋买办，在“洋人”面前奴相十足，而在人民面前，又狗仗人势，倚强凌弱；许多官僚士大夫，在国破家亡的危机状况下，还高唱东方精神文明胜于西方的滥调，有的甚至说什么“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这一切不都是“精神胜利法”的突出表现吗？处于没落时期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者及其奴才们，为了继续维护其反动统治和虚假威势，总是自欺欺人地不敢正视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敢承认失败，吹嘘自己的强大。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正是一切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阶级特性。

但是，既然“精神胜利法”是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思想，为什么在雇农阿Q的身上有着明显的表现呢？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①他们又说：“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5—46页。

统治阶级支配的。”^①“精神胜利法”也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一样，通过封建统治者及其大小奴才们的统治和传播，严重地毒害着被统治阶级。使得被奴役与被压迫者，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丧失掉自信心与革命性。生长在未庄阶级压迫下和奴隶主义精神文明腐蚀下的落后农民阿Q，正是这种被毒害的典型。但是，很显然，受了这种精神毒害的阿Q，是不同于这种精神的创造者们的，在阿Q性格中潜在着反抗的因素，这是他的被压迫阶级的地位决定的，只是这种反抗受到了“精神胜利法”的歪曲，变成了消极的甚至有害的东西。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精神胜利法”的创造者是没落腐朽的封建统治者，那么，鲁迅为什么不找一个剥削阶级的人物来揭露和批判这种精神，而要选择一个落后农民来揭露和批判这种精神呢？对这个问题，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作了很好的回答：“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描写象阿Q这样的“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一方面是为了“揭出痛苦”。通过对落后农民阿Q受“精神胜利法”毒害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的深刻剖析，不仅揭示了当时社会上“精神胜利法”毒害的严重性，而且对于这种精神的创造者剥削阶级进行了有力的鞭挞，这就是为什么当《阿Q正传》发表时，许多剥削阶级的人物感到惶恐不安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深深懂得，没落时期的剥削阶级的“精神胜利法”是不可救药的，是根本无法去掉的，就象是他们的影子一样将要一直跟随到他们的灭亡；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第393页。